

我国传统经验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孙长虹

经验方式是传统思维的最主要的偏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侧重对事物的整体联系以及现象的认识。在经验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主客体没能显著分开,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在知识形态上,经验思维形成的是以主体的差异性为基础的高度私密的隐性知识(技术)。由于思维的惯性和惰性,思维方式具有锁定性,不利于认知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实现思维方式从自发到自觉的超越。

[关键词]思维方式;经验;天人合一;隐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27-05

孙长虹(1972—),女,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闽江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 2011 年 A 类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传统职业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JA11214S)的阶段性成果。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中,中西方创造了迥异的文化,这是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背后对人类行为起到支配作用的一种稳定方式,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会有自己的特点和偏向,与发源于古希腊的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思维方式相比较,我国传统思维偏向于经验方式。

一、经验方式——传统思维的主要偏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传统思维走的是一条经验的道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其依

据就在于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有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形而上的用理性去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当然,经验方式与理性方式绝对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理性总要以一定的经验为基础,经验也是在一定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我所指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偏向,是指从总体上看是一种以经验方式为主的偏向。黑格尔曾经说过:“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1](P119)]虽然话有失偏颇,但却点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显著特点:重经验、重伦理。英国汉学家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也认为,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反抗了那种超出了自己的经验

范围而去研究事物的想法。正如孔子所阐明的那样,怀有对将来的朦胧观念和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对中国人的所有需要来说就已经足够了”^{[2](P10)}。的确,遍寻孔子的著作和言论,形而上地对自然事物的思考确实很少,“子不语怪、力、乱、神”^{[3](P72)}。孔子对自然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兴趣,《论语》主要是其伦理经验的记录和概括。其他很多思想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经验思维方式的形成主要是侧重于对事物的整体、外部联系和现象的认识。传统经验思维方式相信自己的感觉经验,就如俗语所说:“眼见为实”。人们相信的是依靠自己的感官所得来的认识,而依靠感官经验的认识是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感性认识是人们的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方面、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它以直接感受性为特点,以事物的现象为内容。以感官经验把握事物,必然使人拘泥于事物表现出来的外在现象、外部联系,形成的是关于事物的整体认识。从神农氏遍尝百草到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关于外界事物的认识完全是人的感官经验得出的,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分析而来,由此得到的是关于事物的整体认识。如中医里的草药的性甘、性平、性辛等等,以及有什么样的功能,具有的是对其总体性状及功能的认识,具体到每种中药的成分以及草药相互之间是怎样发生反应并起到治疗保健作用的,则无从得知。古代道士的炼丹和中医的熬药有着类似的原理,都有点类似于现代的“黑箱”操作,注重的是整体的功能和结果,不注重其组成部分及发生原理。在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比如对天象的观察,古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性的认识,看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诸如“东霞轰隆西霞雨”、“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具体到天气变化的真正原因则并不了解,得到的只是主要以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为内容的知识。

二、经验思维方式的理论表现形态——天人合一

在传统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经验思维的产物。传统思维面对着观察所得的现象,并没有走向科学,而是把现象与人事结合起来看待,形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从经验思维出发,缺乏理性的反思,必然导致的是现象的合理性。一切现象“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切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存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一切自然如此,一切事物是其所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循自然,就像老子所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P163)}因而,在经验思维方式中,自然界中一切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其所是,消解了对其认知的必要性。对自然界中的大量异常现象,传统思维基于经验的类比推衍,把客体与主体联系起来,用客体现象去解释主体之吉凶祸福,从而也消解了对异常现象本身进行认知的必要性。

《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有星孛入于北斗。”^{[5](P379)}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令我们自豪的哈雷彗星观测记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本质正是科学的任务。但是,传统思维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乱死。’”^{[5](P379)}在这里,传统思维并没有把外在的异己力量当作认知的对象,并没有注重对象本身,而是与主体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把天象与人事联系起来,主客体未有显著之分,因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为认知型的思维方式,就如冯友兰先生所分析的:“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是,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

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6]

(P8)

“天人合一”思想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消解了对外界自然的认知的必要性,扼杀了科学认识活动产生的可能性,把人的精力和智慧集中到人伦道德中,这是中国古代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这种思想以道德为出发点,客观上取消了认识外部客观世界的必要性。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用龟卜,即利用灼龟所显示的自然兆象来推测事物之吉凶。周代有了八卦,仿照的仍然是龟兆之理。后来随着理论的发展,阴阳、五行、八卦渐成体系,物象与人事合为一理。通过对现象特别是天象的推衍比附来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汉代董仲舒把“天人合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他认为:“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之以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7](P259)这样,用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解释了自然异象之原因,从而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

这种自然观和伦理观的融合方式,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停留于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不可能把自然现象当作独立的客体加以研究,客观上取消了认知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在这种‘天人感应’的自然观的统辖下,要想摆脱道德思想的影响,把自然现象当作独立存在的客体来加以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8](P163-164)“天人合一”思想在传统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传统思想的主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认识主体用人事来解释自然现象。“六月飞雪因窦娥”,不仅对一切习以为常的现象没有认知的兴趣和动力,对异常现象也没有认知的主观需要和行

动,从而彻底取消了科学得以产生的可能性。这种思维方式开启了古代中国道德立国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经验的认知方式使人们的所知所想囿于感官的范围内,主体容易产生满足心理,满足于基本的感官需要。这样的思维方式令主体对自然的兴趣不大,转向人伦道德,在人伦、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梁漱溟指出:“中国人虽不能像孔子所谓‘自得’,却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很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种发明创造。”^[9](P155)就如中国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的满足,连天上的神仙都羡慕,要下凡来过凡人的生活。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满足于在人伦关系、人际交往中获得幸福,消解了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和改造的动力,使得我国古代社会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只是以缓慢的速度发展,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善,始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式的发展阶段和现象。

三、经验思维方式形成的知识形态——隐性知识

经验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知识形态主要是隐性知识。我国传统思维的经验性特点是缺乏理性的抽象和加工以使之普遍化、系统化,只是基于个人感官经验,因而,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得来的经验性认知必然走向个体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知识是个人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高度私密的隐性知识,不但难以普遍推广,更难以继承和发展,就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P53)传统文化推崇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性,道理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强调的是主体个人的体悟。因而,传统思维形成的知识就是基于个人经验的隐性知识,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就如赵林先生所分析

的:“从事直接的实践活动的工匠们大多为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虽然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他们无法对这些发现、发明和创造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不能使具体的技术上升为抽象的科学理论。由于不能抽象为科学理论,技术带有狭隘的经验性,许多发明和创造随着发明者的死亡而失传,例如北魏以前的白口铁退火制取铁球技术,唐代以前出现的鱼洗,墨子制造的飞行器,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等等。张衡去世,地动仪就失传了;李春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建造出赵州桥那样杰出的桥梁。即使是数学这样高度抽象化的科学,由于在中国偏重于解题的运算技巧,也成为与个人经验密切相关的一种技术化理论,随着某一位天才数学家的谢世而处于消歇。”^[8](P167-168)]此外,由于技术的实用性及功利价值,很多民间技术为了防止技术外流,有一套严格的保密措施,比如“传男不传女”之类的,称之为“祖传秘方”,秘不示人,使得很多技术往往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不利于知识、技术的积累、传播和发扬。

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思维则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理性之路。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思索开始,西方注重的是对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追寻。在理性思考和经验观察之间,西方人更相信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理性的思维方式能通过理性的反思,不断地发现矛盾、发现问题,激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人类最宝贵的思维就在于在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新思路。正如人类文明史以来,无数人都曾目睹过苹果落地的现象,但是对这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产生质疑,从而发现万有引力并且开辟了物理学研究的一片崭新天空的,只有牛顿一人。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知识消除了主体感官经验的差异,是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得到清楚表达和明确分类的编码知识,有利于知识的传播、推广和继承。

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10](P3)]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态度正是科学所需要的态度,主体的理性中充盈着浓厚的认知兴趣、内在的认知动力。发展到中世纪后期,人们从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发展到对上帝创造物的认识,通过体悟上帝创造物的完美从而体悟上帝的完美,在认知内容上发生了伟大的转向,重新激起人们对认知外在世界的极大兴趣,从主客观的角度,确立了认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思维从经验方式出发,注重的是对事物现象的观察,形成的是关于事物整体的、联系的认识,产生的大多是实用型的技术,并且大多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西方思维基于理性,注重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探索事物的本质,形成的是以编码形态存在的知识。因而,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的,可以表示如下:

中国传统思维: 经验→整体、联系→现象→技术(隐性知识、技术)

西方思维: 理性→分析→本质→科学(编码知识)

四、思维方式之锁定与超越

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稳定性、恒常性和继承性的特点。人类在其发展的原初状态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如遗传基因般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就是思维方式的锁定问题。思维方式的锁定是由思维的惯性和惰性所决定的。

思维的惯性是指思维的定势性,囿于传统的模式,因循守旧,不思改变;思维的惰性是指思维的懒惰,懒于改进和创新。惯性往往意味着无力改变,缺乏变革的可能性;惰性意味着无意改变,缺少创新的内在动力。惯性和惰性都使得思维固守旧有的方式,无法创新。由于思维的惯性和惰性,传统以经验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直到今天

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生产和生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汽车设计的。针对车祸现象,我们的思维是把预防与减少车祸放在加强对驾驶者的严格要求和管理上,从人的角度进行控制、预防。西方思维则注重研究更智能、安全保障设施更完备的汽车以实现预防与减少车祸伤害。这就是经验思维与理性思维相区别的一个生动事例。我国传统思维注重依靠人的感官、经验等感性能力,西方则依靠人的理性制造出更先进的、具有普适性的工具。前者忽视了人的感性能力的差异,更多依靠的是主体的隐性知识和能力,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与现代化大生产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后者则通过理性的造物——工具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感性能力的差异,从而更有利于所有人都享用理性的成果,并且为更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机会。

思维方式一方面具有锁定性,另一方面又是可以超越的。因为思维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思维的载体,而人脑的潜能是无限的;另外,思维的内容来自于客观世界和主体本身,这些也是无限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封闭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需要与外界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思维方式也是如此。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扩大与加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思维偏向进行调整,校正其中的不利偏向,不断完善和创造多样的、有效的思维方式。

我国传统思维的经验性偏向体现了我国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陆地农耕文明的特点。人类最初形成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能动

性的发挥,这种依赖会越来越小。人类的文明进步体现在人类不断地“脱域”,即脱离特定的场景而具有普遍性的过程,不断地摆脱环境对人的束缚和约束状态,实现更大程度和范围的人的自由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不断地摆脱思维的惯性,摆脱锁定,实现超越。陆地农耕文明塑造了传统思维方式,然而,思维具有永不停歇的节奏,随着文明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中的有益成分,突破原有框架的束缚,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意识,实现思维方式从自发到自觉的转换,构建新型的、更为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从而推动科学文化乃至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 [1](德)黑格尔.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李晨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清)洪吉亮.春秋左传诂(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赵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龚剑飞】